



高教投资研究

论人力资本观与教育投资战略

厦门大学 武毅英

人力资本观对各国教育投资战略的影响是从二战开始的。根据战后各国对人力资本重视的程度及教育投资比例的大小,一般地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教育投资战略:^①一是偏重物力投资的发展战略,即物力方面的投资约为人力投资的20倍。二是偏重人力开发和教育投资的发展战略,即物力方面的投资仅7倍于人力方面的投资,或者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三是物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并重的发展战略。其中,第二种类型的教育投资战略主要是依据人力资本观制定的。各国实施战略的结果表明:上述三种发展战略中,凡选择第二种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多数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或赶超,而选择其他两种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多数经济呈进一步恶化状态。有鉴于此,许多发展中国家才紧随其后纷纷调整了战略并选择第二种模式作为各自未来的发展战略。当前,我国的教育投资战略也面临转型问题:即从第一种模式转向第二种模式。但是决策和措施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加以引导,因此我们除了应认真总结和吸取各国的经验教训外,还必须进一步探讨人力资本观在制定教育投资战略中的影响和作用。

一、早期人力资本观

对各国制定教育投资战略的影响

人力资本观是西方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它产生于二战以后,盛行于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形成理论体系,70年代后则进

一步发展。该理论最先由西奥多·W·舒尔茨在美国创立,紧接着对北美、西欧产生广泛影响,尔后才在东欧、亚非拉国家迅速传播。虽然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可追溯到18、19世纪,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人们才试图去衡量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②早期人力资本观在其还未形成理论体系之前,一些基本观点已有相当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它才可能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投资战略产生重大影响。其重要观点有:

1. 人力资本的资本属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表现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必须经过社会或个人的长期投资方可形成。其二,它还表现为一种价值运动,具有增殖能力,就像物质资本投资可获得一定的利润和利息一样。^③劳动者接受教育和掌握知识的过程在价值上表现为各种投入的消耗,而劳动者则以一种既定资本存量的形式存在,他可以创造出即期或远期的产量和收入流量。这些收入不仅能补偿过去的投资,而且还会有净收入归劳动者占有和支配。

2. 教育是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教育能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可创造更多物质财富;^④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增加教育投资就是增加生产性投资,可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与他收入的高低是一致的,而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将决定其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等等。

上述观点对战后的西德和日本确有重大影响。它们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制定了重

视人力开发及教育发展的投资战略,即先致力于在经济发展前期普及初等、中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待国内人力资源存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大规模地进行物力投资。正是由于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和投资的结果,才使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在战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这期间美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的经济也不断出现好的势头,为此,经济学家们加快了在人力资本观方面的实证研究。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发现,工人从较低产业转到较高产业时收入会增加。据其计算:产业间的劳动力转换所造成的收入占总收入增长的40%,其余的60%则来自于工人在转换工作前对自己的种种教育投资。另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的计算,美国1929—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有20%归因于教育。^⑤舒尔茨还根据其他经济学家对农业增长结果提出自己的看法:“没有对人的大量投资,就不能享受现代化农业的硕果,也不能拥有现代化工业的富裕。我们经济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人的资本的形成问题。”显然,这些科研结果一再强调和论证的便是教育对于经济发展有直接的功利作用。

西德与日本在战后的成功之举,为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树立了榜样。以色列、韩国、台湾、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均选择了与之相同的教育投资战略,但实施的结果却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经济的持续增长或腾飞。如以色列、韩国和台湾。另一种则是经济的进一步衰退或恶化。如印度和斯里兰卡。究其原因,当然有多种,但其中一点,前者主要是由于教育投资适度、战略应用得当;而后者则主要是由于教育投资过度所致(尤其是昂贵的高等教育投资),使得教育的产出量大大超过经济发展所能吸收接纳的能力,造成人才供过于求,使得有限的投资发挥不出应有的效益。由此看来,在实施重视人才开发和教育发展的投资战略中,求实、循序、适度和协调的理性选择和相应提高人力素

质,才是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的良策。

对于实践中人们产生的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疑惑,舒尔茨认为^⑥:我们正处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动态世界里,一个国家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投资,只能根据市场需求来调节。由于教育制度是由一连串的联立方程式组成的,改变一个变量,其余的变量也会随之改变。因此,把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过分狭隘地固定化是危险的。经济是在不均衡状态中发展的,教育也是在适应和不适应中发展的。

当然,除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之外,经济与社会、政治、人口、文化传统等诸种因素的关系处理也极为重要,因为这些因素的变化同样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发展战略而言,选择重视人力开发和教育发展的投资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其成功的机率最大,失败的机率最小,故该模式仍有继续存在的客观基础。

二、当代人力资本观

对各国制定教育投资战略的影响

鉴于当代各国对人力资本观的重视,我们国家在制定新的发展战略中,既希望新的教育投资战略能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不希望重蹈印度、斯里兰卡的覆辙,因此极为关注人力资本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

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以来,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又有重大进展。主要是基于对战后各国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并在多学科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国际比较以及实证研究和自然主义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得出下述结论:①欠发达国家的教育利润率通常较大,其中初等教育能产生最高的利润;②在欠发达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利润大大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利润,而在发达国家这两种利润几乎是相等的;③在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率有实质性贡献;④与其它层次的教育相比,高等教育成本昂贵,尤其是在欠发达国家^⑦;⑤世界上35

个最富的国家在其经济“起飞”之前,初等教育入学率都已超过了10%,而在过去的100年间,未首先使初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0%的国家,没有一个获得过显著的经济增长^⑤;⑥一个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对教育的发展水平有着不同要求;⑦强调在处理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问题时要突出“适度、协调、优化”的观念^⑧,即务必使物力、财力等物质投资与人的智力开发之间形成系统化的优化的结合,努力使有限投资获得较大收益。

当代人力资本观的上述观点对各国制定教育投资战略仍有相当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

1. 教育投资的生产性日益受到重视。随着国际竞争焦点日益集中于人才和智力方面,各国对人力资本及对教育投资的认识也日趋加深。原先选择重视物力投资发展战略的国家和地区正试图改变已有的战略;原先教育投资过度的国家正逐步调整教育投资的比例和结构以期获得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原先是发展中国家目前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教育投资战略,则日益重视人力投资与物力投资的平衡。总之,教育投资作为一种比物质资本投资更具效益的生产性资源,受到愈来愈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每年的教育经费支出就达5千亿美元,成为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开支^⑨。

2. 战后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在抓紧经济建设的同时,仍大量投资于教育,作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成本。战后实现赶超的国家和地区有西德、日本、以色列、韩国和台湾等,进入80年代后仍继续加大教育投资量。据资料显示:^⑩1982年韩国教育公共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3%,新加坡为4.5%;同期韩国教育开支占政府开支的比例为21.5%,新加坡为9.6%。被誉为亚洲第五、第六小龙的马来西亚和泰国也不甘示弱,在教育上的投入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四小龙”。显然,教育投资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稳步

增长是其经济增长或腾飞的深层动力。

日本在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龙头之后,仍进一步提出了重视智力开发的口号。政府强调指出:在任何困难情况下决不压缩教育投资。事实上近年来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其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8-11%,为世界各国之首。

以色列的情况可能鲜为人知,这多半是由于战乱和政治上的原因。但是,该国在教育方面的努力以及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工业化、农业化和兴办新兴产业的过程,则有必要提及,它的经验对我们也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949年该国实行了9年免费义务教育;60年代其教育预算平均占国家预算的11%,占国家总收入的8.5%,仅次于国防开支;1978年免费义务教育则延长至14年;1979年大专以上职工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63年的12%增至26.1%^⑪。可见,其教育立国的宗旨是很明确的,即使战乱也不曾改变。

3. 如何结合国情来克服在实施教育投资战略中可能产生的不利因素已日益引起各国的重视。许多迹象表明,各国在追求使教育与社会经济等方面相互协调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所选择的教育投资战略模型也很相似。但是,由于各国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人口状况、历史文化等互异,所制定的战略目标和遵循的指导思想、方针和政策措施等不同,由此收到的效果和取得的经验教训就有很大差异。如何紧密结合本国国情同时参照人力资本理论的新的研究成果来研究处理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已日益受到各国的关注。例如,重视人力开发和教育投资的战略在当今的国际社会里十分盛行,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更注重投资结构和比例的适度,更重视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层次和总量的需求;而发达国家则较重视人力投资与物力投资的最佳比例以及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又如人口资源丰富的国家,投资战略较重视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初等教育和中等教

育;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除了重视国家经济发展对人口素质提高的需求外,还非常重视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对个人素质的需求,因此对应用科学以及人文科学方面的人才培养都极为重视。许多国家根据本国的国情分别得出了处理教育与经济发展孰先孰后的三种指导思想:第一种是教育投资“先行”论,第二种是教育投资“同步”论,第三种是教育投资“滞后”论。但总的来看,“先行”论只为少数国家和地区所采纳,“同步”论则为多数国家所采纳(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以及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而“滞后”论,虽战后以来已被无数事实证明是一种没有多大希望的论调,然而客观上还有其存在的市场,尤其是当人们对教育的经济功能还将信将疑的时候,投资战略的重点要转向教育方面就有相当的难度。

三、以人力资本观为指导思想 制定合理的教育投资战略

根据当代人力资本理论已成为教育经济学的核心这一特点,我们国家在制定教育投资战略的过程中就不应再回避这一客观现实,而应主动将其作为相应决策和措施的指导思想来看待。

从我国现行的教育投资体制来看,还未真正摆脱传统观念的掣肘,一整套运行机制还存在着某些不利人力资本形成和开发的方面,其主要表现有这几方面:1.教育的生产性虽已被理论界所接受,但并没有被决策部门所采纳,教育的纯消费观念仍继续支配着决策行为。据资料显示:^①我国的综合发展水平居世界120个国家中的第70位,但教育经费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居第98位。这个比例远低于5%的世界平均水平,更无法和7-8%的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这种不协调性必然制约人力资本的开发。

2.教育投资战略仍主要依据投资基础和投资目的来制定:一是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给

教育部门的财力、物力的数量,包括政府、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等潜在的教育投资数量的总和;二是经济发展对各级各类教育的需求。我们并不否定教育的发展应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但先安排好各项物质投资,剩余部分才用于规划各类教育或待各项物质生产发展后再致力于发展教育,这实际上仍是一种重视物质生产而轻视教育的做法。据权威人士透露:我国近几年教育投入占GNP的比例仍有所下降:1992年为2.9%、1993年为2.7%、1994年为2.7%,而GNP则持续以9%的速度增长,物力投资也猛增不减。这种状况表明:固有的投资观念仍牢牢地影响着投资决策。

我国之所以会产生过份倾向于物力投资而轻视人力投资的格局,是有其深层原因的:一是深受前苏联模式的掣肘,只看到教育具有消费性的一面,而未认识到教育也具有生产性的一面或者虽认识到教育的生产性,但仍认为其消费性大于生产性;二是教育部门的权限对整个国家的投资决策不产生重大效力。这主要是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待教育的态度影响到其在政府部门中的地位和作用,故教育家们的呼声、教育部门的措施并没有得到其它部门和行业的响应。在这点上其他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曾担任白宫总统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海勒,在一次由18个国家参加的“经济增长与教育投资政策大会”上强调指出:“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教育人们了解教育”、“经济顾问们应当在发展教育事业的战场上同教育部长们并肩战斗”。

综上所述,我们在制定未来的教育投资战略过程中,有必要认真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正确选择教育投资模式。按综合国力和人均GNP水平划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选择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发展的模式,是有其理论依据的。因为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力

资本投资的利润要高于物力资本投资。

第二,根据“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对等关系”的原理,选择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战略还需要考虑教育投资的“过度”和“适度”问题。“过度”问题主要是指要防止教育投资比重过大或教育投资投向结构的不合理性;而“适度”则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阶段对各级各类人才的实际需求关系,即平衡协调关系。

第三,应根据人力资本观和社会需求来制定我国未来的教育投资战略。这种模式主要是在已确定以人力资本投资为重点的前提下,按教育投资占总投资量的相对值和绝对量来规划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级各类教育。这里所指的总投入是指人力投资和物力投资的总和,也可理解为政府、社会、个人以及其他形式的投入;这里所说的社会需求是指各行各业对各级各类人才或劳动力的实际需求,这种需求可能较大,但因为教育投资总量的限制,故不可能完全满足,这就所谓有多大能力就办多大事,也是“适度”的一种表现。

第四,教育投资战略不能仅仅依靠人力需求预测,还应以市场供求关系为依据,以人力价格的浮动为衡量信号,把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政府或教育部门组织的人力需求预测,对教育投资战略还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当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教育部门再想对复杂多变的市场进行人力需求预测、规划和按计划实施,已是不现实的事。因此,未来教育投资战略的制定还须考虑市场供求关系的波动,以此判断人才市场的走向,并根据人才价格的浮动,以确定增加或减少某级某类教育投入量。

第五,教育“超前”论,虽然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力的需求,同时还能满足个人不断发展的需求,但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基础、发展水平等都还不足以满足所有各方面的需求,因此我们在制定教育投资战略时应以协

调、适度、优化为限。强调“超前”是可理解的,但不现实。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超前”论与“适度”论都是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战略的表现。我们并不反对有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的教育先行,但是经济发展本身也有波动性,一旦经济增长达不到预期目的,就可能导致教育发展规划超出经济的实际需求,进而出现教育投资过度的现象。再则,经济的超速增长往往不会持续太久,因为这种经济增长是短暂和掺水份的,终究会从高增长率水平上跌落下来,而经济超速发展的势头一旦停止,自然就会产生教育投资的相对过剩。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观是制定教育投资战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依据,但并不是唯一的。像人力需求理论、成本效益理论、社会需求理论、超过教育理论等也有其参考价值。此外,人力资本观也有其明显的功利目的和消极的一面,但我们不能固守原有的价值观而无视它的积极的一面,而应在转变观念的同时,认真探讨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宏观基础。

注释:

①参见王向东《略论教育投资战略的演变及其形式》,《高等教育研究》1992年第1期。

②⑦⑧戈麦斯·凯斯雷诺斯·L著《教育经济学:比较研究(上)》,《高教与经济》1992年第1期。

③参考江可申《论人力资本与教育》,《东岳论丛》1993年第5期。

④参阅夏禹龙、刘吉等合著的《论智力开发》第2-6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⑤⑪⑫俞新天《教育:应着眼于人力资源的开发》,《科技导报》1993年第2期。

⑥参见北师大教育系《教育经济学》研究组编写的《教育经济学》第16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⑨张渭城《当代教育经济思想发展述略》,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1990年第2期。

⑩参阅谈松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国高教研究》1994年第2期。

⑬白同翔《教育指标仍然很不相称》,《社会科学报》1993年4月22日。

(责任编辑 孔庆茂)